

# 孟子“久假而不归”的王霸之辨

■杨海文

《孟子》13·30的字数不多,但从王霸之辨的角度看,它在孟学史上的解释难度非同小可。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是一部分,“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是另一部分。后一部分是难点之所在。

先看第一部分。《孟子》8·19谈到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8曾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所谓“勉强行之”“安而行之”是孔子的说法,出自《礼记·中庸》:“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再剥一层笋子,我们知道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16·9)

以孟解孟,“性之”是“由仁义行”;以孔解孟,“性之”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同理,“身之”是孟子说的“行仁义”,是孔子说的“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联系《孟子》14·33说的“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来看,“性之”亦即“性者”,“身之”亦即“反之”。“性之”是说尧舜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不假外求,水到渠成;“身之”是说汤武做人做事,战战兢兢,气养浩然,行守规矩。“性之”的境界高于“身之”,这是孟子的本意。

再看第二部分。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从尧舜与汤武到五霸是走下坡路,从“性之”与“身之”到“假之”

亦然。按照刚才那种以孔解孟的思路,我们能说“假之”就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吗?

《孟子》3·3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讲王霸之辨,基调是尊王黜霸,但没有给霸道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空间呢?既然只靠拳头难以服人,行霸道的人不傻,就会把仁义加进来,亦即以力假仁。我们能说这是“困而学之”吗?你再看:把仁义加进来以后,成就的不是小国,而是大国。我们能说这是“勉强而行之”吗?

孟子那个时代叫作战国时代。如果以力假仁做到极至,这个大国不就是整个天下吗?孟子不是孜孜以求天下“定于—”(《孟子》1·6)吗?所以,孟子说五霸“假之”并不是贬义的,而是隐隐约约寄予了某种期望。但是,朱熹未必赞成这一看法。其《孟子集注》卷13说:“言窃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真。”孟子说“假之”,朱熹说“窃”,两者的含义完全一样吗?

假者,借也。我们试把孟子说的“假之”换成以下情形:有件东西,所有权一直是张三的,使用权一直在李四那里。李四为何一直使用这件东西?盖因他经过张三的同意,把东西借来了,但再也没归还。既然张三同意把自己的东西借给李四,那么,即便李四再也不归还,我们能说李四是偷吗?朱熹把“假之”理解为“窃”,有过度解释的嫌疑吗?问题来了:我们能说仁义比作

实实在在的一把锄头、一头牛吗?假如可以,仁义究竟是谁的?有没有一个叫张三的是仁义的主人?然后,李四从他那里借来仁义?这类提问显然不是好的提问,甚至会让提问者陷入死胡同。按照孟子的逻辑,仁义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仁义是具体的抽象、抽象的具体,圣人能把抽象的仁义转变为具体的仁政。五霸之前,尧舜、汤武治国理政,靠的就是仁政。所谓“假之”,是说五霸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同样拿仁政来打理国家。

真正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客观而言,假如五霸一直拿仁政来治国,再也不行暴政,那么,久而久之,仁义会变成五霸自身拥有的东西吗?“黑五霸”会蜕变为“红五类”吗?另一方面,就主观而言,在“久假而不归”的情形下,五霸最终会把仁义当成自己真实拥有的东西吗?若是如此,“黑五霸”不就成了“红五类”吗?

论客观,朱熹说“窃”;论主观,朱熹说五霸“不自知其非真”。换成大白话,五霸再怎么努力行仁义、行仁政,也是白搭。说到这里,黄宗羲(1610—1695)堪称朱熹坚定的盟友,其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子师说》卷1“齐桓、晋文之事”章就说:“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事功本之心术者,所谓‘由仁义行’,王道也;只从迹上模仿,虽伴件是王者之事,所谓‘行仁义’者,霸也。”

回溯思想史,有些思想家并不把王霸之辨看成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扬雄(前53—18)的《法言·孝至》说:“假儒衣,衣服而读之,三月

不归,孰曰非儒也?”在此,从假到真,三个月就够了。孟子说的“久假而不归”,至少不止三个月吧?赵岐(?—201)说:“五霸若能久假仁义,譬如假物,久而不归,安知其不真者?”(《孟子正义》卷27录)你客观上行仁义,主观上就有可能把仁义当成自己的东西。赵岐的暧昧之意跃然纸上,但骨子里呢?他显然是肯定五霸最终在主观上也会把仁义当成自己所有的东西。

朱熹的《孟子集注》卷13注云:“旧说,久假不归,即为真有,则误矣。”这是含沙射影地批评赵岐吗?注意,赵岐只是骨子里肯定,而“即为真有”是千真万确的肯定语气。那么,朱熹是在批评同时代的思想哥们张枋(1133—1180)吗?张枋的《孟子说》卷7曾说:“若使其久假而不归,亦岂不美乎?夫假假之者,未有不归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归,则必有非苟然者矣。是必因其假而有所感发于中,而后能然也。至其不归,则孰曰非已有乎?有之者不系于假,而系于不归也。孟子斯言,与人为善,而开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与来世者,亦可谓弘裕矣。”张枋说《孟子》13·30是孟子“开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与来世者”,不就是“即为真有”的意思吗?

在金代的王若虚(1174—1243)看来,张枋“其说甚好”,朱熹“陋哉斯言”。其《滹南遗老集》卷8《孟子辨惑》还说:“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趋于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皆在所取,以为成功则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尧舜,举皆徒劳而益,谁复可进哉?方渠

未成书时,尝有此义,质于南轩,南轩答之如今所说,而卒从己意。甚矣,好高而不同也。”这番话说得有点绝:前面一半,旨在呼应张枋说的孟子之“弘裕”;后面一半,揭秘了朱熹没有采纳张枋之说的思想史往事。

如果有兴趣,再加上有时间,任何人都可以拿《孟子》13·30说的“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写出一本不薄的小书。思想史是聚讼纷纭的历史,不会有标准答案。要问我的意见,我只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性之”“身之”“假之”的成分:首先有至亲之情。天生就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小孩,这是“性之”。所以我们离不开家庭,一定要重情。其次有人伦之礼。“克己复礼为仁”(《论语》12·1),后天的修养,践行十分重要,这是“身之”。所以我们离不开教化,一定要讲礼。第三有社会之法。它们原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后再也没有归还,慢慢变成自己的美德,这是“假之”。所以我们离不开管理,一定要守法。

我们的一生短暂,甚至不免有些局限,但这三种成分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切记:“性之”“身之”“假之”均以仁义为本。现代社会既需要以德治国,更需要依法治国。仔细掂量一下,你能不清楚管理、“假之”占有多大的人生分量吗?你借得越久越好,甚至一辈子不归还,甚至根本就不借,此乃孟子之忧。至此,我也终于在朱熹、张枋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作者为中国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 成败由词话柳永

■陈 林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婉约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易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故称柳七,因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有词集《乐章集》传世。

柳永与豪放派词宗苏轼都是北宋词坛上旗帜性人物。据《京江柳氏宗谱》载:“仁宗时,耆卿(柳永)亦饶有文誉,而于音律尤精,东坡每见其词,自谓不及。”柳词词风婉约,长于音律,连苏轼都“自谓不及”,尝引为标杆:“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

柳词很受坊间欢迎。“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歌女们竞相趋奉柳永,“要索新词,嬖人含笑立尊前”(柳永《玉蝴蝶》),以得到柳词为幸。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花衢实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以词换资,收入颇丰。

柳词流传甚广,原因有二:一日变旧作新。柳永是两宋词坛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掩众制而尽妙”(胡寅《酒边词序》),大量创作新兴曲调。据统计,在宋词880多个词调中,属于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的就有一百多个。柳词的成功“是得力于新声,即大量新兴曲调的。”(吴熊和《唐宋语词的演变》)

二曰直言近俗。柳词贴近市井,“直以言多近俗”(严有翼《艺苑雌黄》),“尽收俚语俗编入词中”(宋柳永《乐府余论》);“浅近卑俗,自成一体”(王灼《碧鸡漫志》);经坊间传唱,上达宫廷,下传民间,可谓风头无二。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舐舐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坊间传言:“不愿穿綾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吊柳七》)此虽小说家言,却大抵相符。

柳永平日“流连坊曲”(宋朔风《乐府余论》),难免给人以轻薄之嫌。他直言无忌,追求俚俗,走下层面路线的创作风格,加深了他在上层人士心目中的浪子印象,致使才华横溢的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柳永带着“定然魁甲登高第”(柳永《长考乐·九红灯笼》)的自信第一次参加科考。因真宗有旨:“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宋史·真宗本纪》)柳永不幸落第,郁闷之中愤然写下《鹤冲天·黄金榜上》,抒发对科举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愤懑: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红裙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词将柳永一肚子牢骚发泄得痛快痛快,却让他落下轻狂之名,险些误其终生。北宋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第曰:‘非得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复得志,日与猿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直到宋仁宗即位,柳永仍因受此词影响而落榜:“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薄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柳三变词》)

柳永负气奉旨填词,频繁出入“烟花巷陌”,结交歌妓,买醉欢场,不久便把落第的不快抛到九霄云外,作《如鱼水》以示不再介怀:

帝里疏散,数载酒紫花春,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浮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浮名利,抵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因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幌,醉倚菱花唾,算除此外何求。

科场失意的柳永浪迹秦楼楚馆,在欢场中寻求慰藉,认识了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四位艺兼绝色,在《木兰花》里对她们作了细致入微的生动描绘:

一

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

云彩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二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金钩懒掩调累累,文杏梁高空敛黛。

鸾吟凤啸清相续。管裂弦焦寒可逐。何当夜召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

三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态。香檀碾缓玉纤迟,画鼓声喧逐步紧。

贪为顾盼夸风韵,往往曲终情未尽。坐中少却暗调情,争问青鸾家远近。

四

酥娘一搦腰肢束。回雪萦尘皆尽妙。几多媚客看无厌,一舞霓童功不到。

星眸顾盼精神爽。罗袖迎风身段小。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柳永爱上了温润脱俗的虫娘,并偷偷与之幽会。他在《集贤堂》里向虫娘许下觅宅厮守的誓言: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欢聚,良宵永,鸳鸯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尔同。

近来自雨忽西东。悄损恼人情。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莺偕老,免教嫩草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

柳永情场得意,但科场却屡遭挫折。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再次参加科考。在焦急等待发榜过程中他满怀期盼挥笔写下《征部乐》,倾诉对虫娘的眷念,承诺如考中再也不与虫娘分离:

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道追欢,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中。凭谁去,花衢觅。细说此中端的。通向我,转觉厌厌,役梦劳魂香相忆。

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如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弃。

尽管柳永对此次科考充满信心,

然而他又不幸落榜。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再次落第。此时他声名狼藉,加之银钱告罄,在科场与情场间徘徊纠结,痛苦不堪。他想留京待考却又无颜滞留,他不舍情人但又囊中如洗,他不想再让京城显贵们看到他科场落魄寄身青楼的窘态,决定远离汴京,南下谋生,与情人(疑为虫娘)伐别京郊。他欲哭无泪,欲诉无声,以笔代口,作《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词将临别实景与别后虚景相结合,借临别悲情的描述和别后凄凉的畅想烘托相见难期的痛苦与前程暗淡的哀伤,于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离别咏叹中,抒发了生平不幸的感慨和难以割舍的离愁,情挚意深,成为柳永婉约名篇。

柳永出生官宦世家,其远祖柳冕,为唐代文学家,曾官御史中丞,祖父柳崇曾补沙县丞,父亲柳宜曾为南唐御史,归宋后屡迁至工部侍郎(据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君墓碣铭》)。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柳永从小深谙“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兄弟”的道理(柳永《功夫学文》),与兄长柳三复、柳三接从小发奋读书,志在庙堂(兄弟三人先后都中了进士)。作为读书人,科举是求取功名飞黄腾达的正途。柳永虽自负轻狂,寄身青楼,偎红倚翠,自称“白衣卿相”,但他内心并不糊涂,深知可以轻狂一时,不可轻狂一世。科场上的屡败屡试,证明他并未放弃出仕梦想。他徘徊青楼,却又不甘沉沦;他远离京师,即为寻求自救。

在情场得意与科场失意纠结中痛苦挣扎一番后,柳永最终忍痛割爱,远走南方。“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此后柳永在南方以填词为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词名远播西夏。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政开“恩科”,对历年沉沦不遇的文人放宽科考政策,屡试不第的柳永

才于天命之年获得“同进士出身”,之后做了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定海晓峰盐监等几任小官。他勤政爱民,政声很好,却因得罪仁宗,而难以升迁。南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

渐亭皋叶下,晚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彻。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盖中间误使“宸游凤辇”挽章句。耆卿作此词,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虑出处。仁宗皇帝览而恶之;及御注差注至耆卿,抹其名曰:‘此人不可仕宦,尽从他花下浅斟低唱。’由是沦落贫窳。”

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第八》亦载:“皇祐中,久因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调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柳永《醉蓬莱》极写皇宫华美,粉饰王朝太平。但因“宸游凤辇何处”与御制《真宗挽词》“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虹凤兮何有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二九》)语意暗合,加之“渐”(古人病危将死曰“大渐”)、“翻”(意即位置颠倒)等犯讳之词,触怒仁宗,自然“不复进用”。

可悲的是,不明就里的柳永竟然找宰相晏殊申诉:“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真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宋张舜名《画墁录》)晏殊本意暗示柳永终结所在,委婉提醒他遵守官场潜规则,不要逆揭龙鳞。不料柳永不识好意,反将晏殊“亦作曲子”拿来比附。晏殊只好姑出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中“属词浮薄”的词例相回敬,两人最终不欢而散。直言近俗的词成就了柳永在文坛上的名声,也影响了他在仕途上的发展。柳永一生可谓成亦由词,败亦由词。



本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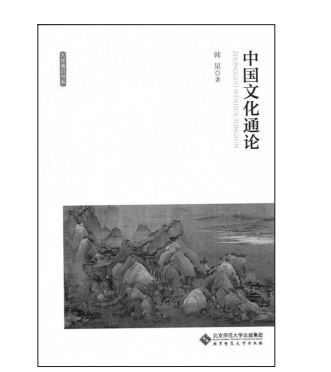
## 《中国文化通论》推出修订版

《中国文化通论》(新版)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为《中国文化通论》2008年版的修订版。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基础上,作者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握其自身的内在特质,摆脱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中国化”学科建设采取“中话西说”形态,即以中国传统文化附会西方文化的问题、架构、语言的过程,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旨在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化悠久历史、丰厚遗产的简明读本。作者重在从多个角度切入对传统文化深层精神结构的分析、概括、提炼,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结构模式、发展历程、基本精神、文化统系、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修养之道、人格范式等方面,较为全面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和多样性,同时,本书也检视了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转型的道路与方向,现代出路的探寻、未来前景的思考,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有所辨析。全书广泛征引典籍文献,结构整饬,条分缕析,具有学者的谨严客观,又能够深入浅出,表述精炼流畅,所引原典作为独立模块镶嵌在文中,使全书的知识接受更多样化。本书适用于高校中华传统文化类通识课,也可以作为普通读者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读本。

作者在吸收近几年中国文史、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学科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宏观概括与微观探讨相结合,文化哲学与文史相融合,知识传授与学术研究相通,历史的梳理与逻辑的分析相结合,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促进的思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而概括地进行研究,不仅为读者提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而且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重要领域、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今天中国文化全面转型、中外文化交流融通,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发展的时代,试图正本清源、正确诠释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新发展,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并着重回答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如中国文化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中国文化为什么在近代落伍了,并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为什么重要转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都提出了哪些观点?中国文化未来前景和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探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本书每一章后专设“专题讨论与考察实践”,给学生留若干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让有兴趣的学生在课外进行更加精深的钻研和探讨。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不光是教室内的知识灌输,亦要注重课外的文化考察,注重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进行文化遗迹的考察、民间文化的调研,切身身体感受活着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通论》(修订版),韩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定价:45.00元